

中華文化大典·文學卷
漢賦文學研究

漢賦 —— 汉朝文学的高峰

汉朝文学的高峰

中華文化大典·文學卷

(中)

中華文化大典·文學卷

《文字与文化》丛书（三）

二十一世纪：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
——安子介语文学术思想评论集

袁晓园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Z05/11

《文字与文化》丛书（三）

袁 晓 园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印刷

1092×787毫米 32开本 印张（7） （151）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1—3000册 定价2.50元

ISBN7—80014—225—6

H·0005

目 录

袁晓园、徐德江：“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	(1)
周有光：评《学习汉语》	(10)
刘庆谔：大胆的探索、丰硕的成果	(13)
李 涛：清除历史积垢、再现汉字光辉	(20)
张拱贵：喜读《劈文切字集》	(25)
董破晓：“部首切除法”是学用汉字上的一个创见	(29)
段生农：评《劈文切字集》	(40)
刘志强：读《解开汉字之谜》后的联想	(63)
朱曼华：柳暗花明又一村	(66)
王红旗：人类文字的大趋势	(71)
卿 明：读《劈文切字集》	(75)
陈田启：澄清迷雾、汉字易学	(80)
胡百华：评《解开议字之迷》	(89)
桥本万太郎：学习汉语方法的新技术	(98)
刘铭等：评《解开汉字之迷》	(103)
梁上苑：汉字的字形、读音与字义的关系	(110)
李敏生：探索汉字发展的逻辑	(119)
曾 鸣：安子介的析字法	(123)
思 放：答曾鸣先生	(128)
曾 鸣：三点分歧	(131)
渠佐权：也谈析字法	(138)

附录 安子介论文选

- 从观念去发掘汉字的根——回答梁上苑先生有关汉字
的商榷 (142)
聪明的翻译 (152)
听的人也要负责 (155)
谈再认识汉字 (158)
一个认识汉字的新方案 (165)
240字占了汉字“常用字”百分之五十八 (171)
“半”千字文 (175)
今代千字文 (182)
观念早于语言 (189)
译评《西方小孩子是怎样“学”字的?》 (194)

“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 威力的时代”

——论安子介先生的语文学术思想

袁晓园 徐德江

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香港语文学会名誉会长安子介先生用英文写了五本巨著《解开汉字之迷》，用中文写了《劈文切字集》和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字的论文。他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造诣都很深，精于八国文字，而且通晓政治、经济、哲学、法学、文学、考古、美术、音乐、医药……知识非常渊博。因此，他在语言文字学术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般语言文字学家。

观念在人脑中早过词语，文字的根在语言

安先生说：“中文里有一句成语：‘只可意会，不能言喻’，实在那是指‘观念’。观念在脑中是浮着的，一经出口就被词儿固定下来。观念在人脑中早过语词，我在做祖父之后，才发觉这个事实。我有一个幼孙，在已能走路但还不能说话的时候，每个星期天由保姆抱着，较他哥哥迟到我家。他们都喜欢脱鞋玩耍，这个迟到的幼孙每次看到他哥哥的鞋，很怒地抓起来叫着他哥哥的名字。显然这意味着：‘为什么他哥哥会早他而来？’”

这种观点与当代儿童心理学、发生学、哲学等学科的一些

专家提出的论断相同。

安先生又说：“大部分中国人以为西方语言是语文一致，事实上，也绝非如此，譬如，把一篇泰晤时报的社评读给一个能用英语流利对话的人听，同汉文一样，他也未必能尽听得进去，能全部听得懂，因为他未必听见过某些字音。即使能听得懂，不能保证他对每个英文单字的拼法会全部拼对。所以不要以为汉文难，英文易。主要还在你妈妈讲的什么话。如果你母亲是中国人（汉族），汉字的‘根’已经种在你脑里”。

观念在人脑中早过词语。在语言产生能够表达观念的同时，人类也能通过表情、手势、结绳、画图等等表示观念。当画图同语言结合使画图具有可读性时，文字便产生了。于是，文字也就成为人类用以表示观念的重要方式。很显然，文字不同于口头语言的根本点是，虽然它具有可读性，与语音有密切的关系，但它表示观念的物质外壳是字形，而不是语音。口头语言是耳治，文字是目治。口头语言和文字密切相关，但又各具特点，各有互相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人类的发展过程以及幼儿成长过程，都是先掌握口语，而后才掌握文字。安先生专写了一篇文章：《视觉重要过听觉》，论述了文字的特殊意义。人类最初创造的文字，都是以字形直接表示观念的象形文字，而不是写音的。后来，在人类文字发展的过程中，文字同语言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因而，由于语言的特点不同，于是文字的发展路线就不一样了。汉语的词汇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汉字的发展同汉语的发展密切结合，促使汉字用平面性的方块形同单音节词相适应。这是个关键。这个关键，使汉字一个字形一个音节，每个汉字不仅与词相适应，而且最后发展到字与词分化为明显的两个概念的高度。一个汉字可以表示一个词（单音词），但是一个词并不都是一个字。汉字的词汇主要是在单音节词基础上层层合成构造起来

的。于是汉字也就随之具有了“以字组词”的特点，可以活用，构词能力极强。这就形成了汉语“词有词理”、“字有字理”的特性。正因为如此，汉字才能保持并高度发扬文字以字形直接表示观念的优点，沿着逻辑性，一步步发展起来。印欧语则不然，它们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构词手段，词汇越来越繁杂，音节也越来越长，用字形直接表示观念越来越困难，于是，在文字与语言密切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以字形写音较为方便。结果，失去了以字形直接表示观念的特点，字与语言单位相适应，只发展到词的阶段，字即词，词即字。没有象汉语汉字那样，词与字进一步发展为两个概念。安先生说：“西方文字：拼形等于读音，但不等于意义。中国文字：字形约等于读音，约等于意义。”这两种文字不同的根源，在于语言不同。

简约是当今文字和语言发展 的主要侧面

语言和文字作为人类信息的主要载体，从产生以来，始终根据两条要求，不断向前发展。为了能够交际，第一条要求是明确，不明确就不能交际，这是首要的。为了交际便利，第二条要求是简约。这两条都出于人类交际的客观需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人类语言文字在产生和起初发展时期，侧重面在于“明确”，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发展日益迅速，在“明确”的前提下，就侧重于“简约”了。就整体上看，语言文字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简而繁。正因为如此，为了便于交流，随着社会的飞跃发展，人类越来越重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语言文字在保证能够交际的前提下，即在“明

确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简约”。

安子介先生在著述中一再说明中文和其他文字都在尽可能变得“简约”。相比之下，“在中文这一特征是常例”，这是汉字的“重要优点”，汉字的简约“比西方现在大行其道的‘首字母缩略词’走早了两千年。”联合国每个决议案的五种文本（中、英、法、俄、西班牙），中文本最薄。1980年3月我们同中外学者在京发起成立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之后，几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实验探索和理论研究，终于发现“明确而简短”不只是汉语汉字的特点，而且是一切语言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正是这条规律，决定了印欧语文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向汉语汉字形成明确简短的某些特性靠近。认识汉语汉字明确而简短的优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1987年8月联邦德国汉语教学协会的蓝安东先生在第二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说：“电脑拯救了汉字。”实际上，简单的打字机根本不可能揭示汉字的奥秘，只有现代化的电脑才能打开汉字智慧的大门。安子介先生向第二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提交的论文，题目就是《汉字的再认识》。

汉语汉字是沿着“观念化哲学化的进路”向前发展的

1987年12月15日安子介先生为《研究生信息》题辞：“中国的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能掌握它的内涵和外延，就能产生无穷尽的联想。联想是人类一切科技发展的源头。”这是对汉字科学性的最深刻而精辟的分析。

中国汉族的祖先善于宏观性思维，注重从事物的全局，事物间的关系，内在联系，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善于联想，善于抽象概括，所以语言文字的结构逻辑性强。汉语有声调，单音

词发达，在单音词基础上层层合成构词，词序严格，利用二维的平面创造方块字形，以丰富的想象力发展了汉字的内涵和外延……这都是人类高度智慧在语言文字结构上的结晶。澳大利亚高能物理博士卢遂现在《汉字的科学研究》一书中，从数学的角度分析，汉语一词多性、词序严格，都是比印欧语概括性、逻辑性层次更高的表现，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郭绍虞老先生积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最终得出结论：汉语单音孤立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印度尼西亚的刘宏谋先生说：“语言是由综合性进化到分析性的。汉语乃是高度分析性的语言文字。”英国的李约瑟先生说，他的两个同行，华沙的雅努兹·克米莱夫斯基和费城的卜德，“已经能够证明中国的语言结构较任何印欧语言更充分、更完善地体现了形式逻辑。”（《李约瑟文集》第334—335页）安子介先生将汉语汉字发展的道路概括为“观念化哲学化的进路”，这从本质上更深刻地揭示了汉语汉字结构的科学性。

从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出发开展语言

文字学术研究和语文教学研究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水平不高，人们十分关切。社会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科学本来是先头科学，十分重要，现在却成为最不被重视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片面的印欧语文理论，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在大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根深蒂固。社会上乱造简化字、乱写错别字，也都是长期严重鄙视汉字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抛弃“汉语汉字落后”的错误理论，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揭示汉语汉字的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

语言学文字学，使人们都能认识到汉语汉字的科学性，为能使用具有高度智慧的汉语汉字而感到自豪。在此基础上，进行汉语汉字的教学，才能迅速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安先生基于对汉语汉字的深刻了解，发现“声旁”都是有意义的。于是发明了一条“切除部首，再予拼合”的“再认识汉字”的正确道路。这不仅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性，也为快速识字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方法。他积极主张要从字频最高的汉字开始教学，他专写了《240字占了汉字‘常用字’百分之五十八》一文，论述了这样教学汉字的好处，并从实际出发，用240字编出适于香港成人学习的21句习题。他特别指出：“为了照顾小孩子初习中文，我们必须予以改编或另造新句，或增加一些可联想起的简笔字；尤其对于‘一字有数解’的部分，须特别注意。”一些有见识的学人已经应用“安氏快速汉字识字法”进行科学实验，初步效果良好。

从科学的求实精神出发，安先生主张汉字字义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字源字义；一个是实用字义。汉字字源字义是专门考究汉字字源意义的。但是，有些汉字现在根本无法了解其字源，只有以人们的想象来确定，以便人们了解和掌握。这就属于实用性的汉字字义了，这是古已有之的。根据国内外人们快速掌握汉字的需要，以现代人的观念，如幼儿、外国人等，不同人的情况，根据汉字的字形，作出他们最易理解的分析。这种分析一般都与字源字义一致，不一致也无妨，目的在于快速掌握汉字，而不在字源究竟如何。有人担心这样是否把汉字搞乱了。其实不然。字源的考证不也存在分歧吗？这并没有把汉字搞乱。现在，另设立一个学科，专门研究依据汉字字形，以幼儿、外国人等等不同人的情况出发，进行解释，这不仅便于人们快速识字，而且使人们能更准确地掌握字形。安先

生为“汉字实用字义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般从事汉语汉字教学和经常同文字打交道的人，手头上都愿准备两本小字典。有不会写的字，查《新华字典》方便；遇到不认识的字，查《四角号码字典》最快。遗憾的是，受错误语文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校里不教授四角号码查字法，使许许多多的人遇到不认识的汉字，失去了一种可以快速查字的便利。安子介先生基于汉字方块形的特点，根据自己发现的汉字逻辑的演变轨迹，结合“部首切除法”，将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进一步提高，排除多字重码，发明了《安子介汉字笔形电脑编码法》（即《安氏四角六码法》）。这种方法不仅比四角号码查字更快，而且更便于中文电脑化。现在安先生发明的易学、易记、易用、易普及而性能颇多的“安子介电脑写字机”已经问世了。安子介先生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渊博的科学知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解开了汉字之谜，为人们正确认识、学习和使用汉语汉字，开辟了一条科学的新途径。

世界语言文字研究的中心有可能转移 到中国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是安子介先生纵观世界经济、政治各方面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和汉语汉字的科学性——用汉字的人的思维方式，易于有创造性的发展，而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预言。他一再宣称：“汉字意义的外延性，实在非常非常富于想象力！这里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一个条件。”“中国文学著作十分丰富，把科学的研究推迟了。现代国人猛省，急起直追，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

一位日本教授评述安先生的《解开汉字之谜》，称中、日、朝为“汉字文化圈”，西方的为“拉丁文化圈”。1986年5月在日本召开的“汉字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些学者认为“汉字文化圈”在“拉丁文化圈”冲击下一度“动摇之后，又出现新的发展曙光。这时候，汉字文化圈对汉字文化的历史和将来进行国际的学术探讨，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内外有人议论，汉字源于中国，但汉字的研究中心可能要转移到日本了。我们的看法与此正好相反，不仅汉字的研究中心不会转移到日本，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根据有以下几点：第一，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将冲破一切保守、僵化的模式，语言文字学界也不可能例外。我们汉字现代化研究会自三中全会之后成立以来，八年实践证明，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也就不会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春天。在中共十三大会议精神鼓舞下，中国语言文字学术研究将会再加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第二，具有高度科学性的汉语汉字主要在中国。国际上一些科技专家痛感语言文字理论太落后了，远远适应不了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当今世界语文理论主要基于印欧语事实产生的。要想使世界语言文字理论走出死胡同，只有认真研究科学性比印欧语文更高的汉语汉字，进一步发现真正的语言文字的共同规律，克服其片面性，才有出路。第三，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特别是电脑，已经能够为认识凝结在汉语汉字结构上的人类高度智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第四，辩证法在中国有极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安子介先生谈到他能解开汉字之谜，除采用了演绎法、归纳法等各种方法外，也采用了辩证方法。恩格斯论述各种科学发展的过程时指出，

只有运用辩证方法才能使“收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当今的语言学，正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只有用辩证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步入“整理材料”的阶段。第五，中国语言文字科研队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量的科技人员涌人语文研究阵地；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只了解和套搬印欧语文理论的人，正逐渐被淘汰；一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和辩证观点而又勇于重新开拓的年轻语言文字学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已经显示了能够开创中国语言文字科研新局面的力量。

汉语汉字在历史上曾对亚洲一些国家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在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方面发达强大之故。现在英文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大，这也因为先是英国，继而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故。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上又出现了汉语热。日本能够博采世界各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自己，并且又创制了纯表音的假名，但仍然不废弃汉字。一位日本专家认为：“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是一种IC（集成电路）。”阿拉伯数字各国通用，均是表意而不是表音的。这些都给人以启发：表意性的汉字是否具有世界语文通用的某种因素？我们充分发掘汉字固有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汉字尽善尽美，不需要改革了。汉字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要发展变化。但是，当前在中国和世界语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的，是汉字的真正优缺点究竟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结论没有得出以前，却把汉字当成“包袱”、“落后文字的海洋”，把汉字的方块形、表意性当作落后文字的标志，那么汉字的改革和发展只能在歧路上徘徊。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8日和9日连载此文时，有删节，题目为《论安子介的语文学术思想》。人民日报国内版1988年2月8日对此有报导，题为《汉语汉字研究有新见解》，副标题是《袁晓园徐德江撰文介绍安子介语文学术思想》。）

评《学习汉语》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 周有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欧美人士都想到此畅游一番，亲自登上从月球可以看得见的长城；如有可能，再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可是，由于中文繁难，中国和西洋之间被一重语文的帘幕隔开，只能朦胧窥看，无法清晰透视。

安子介先生的新著《学习汉语》（英文书名《解开汉字之谜》）是一部给成年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自学书，用英文解释中文。尝试揭开这个语文的帘幕，用他自己设计的新方法，使成年的外国人自学中文，越学越有趣，越学越想学。

安先生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如果我的理解不全是瞎子摸象，他的新方法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从“汉字”入手学习汉语，而不是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先学口语，再学汉字。这个学习方法对成年的外国人最为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有急于窥探汉字奥秘的心理。先学口语，学了好久还没有进入汉字的迷宫，好比只能游览西洋风格的上海外滩而迟迟不能来到北京瞻仰故宫，成年的欧美人士是会失去耐心的。从“汉字”入手学习汉语，要解决一个难题：不使汉字的神秘性吓退读者，而要“打开”它的神秘性，使读者欣然看到迷宫是有门可进的。安先生以170个常用的部首作为第一把钥匙，使读者知道，汉字虽然以万计，书写现代汉

语有5,888个汉字也就够用了，而这些汉字是由为数不很多的部首和构件组成的，掌握了这第一把钥匙就能提纲挈领地处理汉字。他首先使读者熟悉汉字的面貌，消除望而生畏的心理，增进学习的意愿。这第一步就是愉快的一步。

第二，把握住现代汉语的“双音节”特点。汉字都是单音节符号，可是现代汉语的绝大多数语词是双音节的。外国人看到汉字都是单音节的，误认汉语是单音节语。这个误会往往严重地妨碍了外国人学习汉语。安先生自始至终把握住“双音节”的特点，使读者了解单个汉字的原义以后，以“词”为单位学习汉字的引伸意义。这样，避免了学习汉字而脱离汉语的老毛病，使读者收到活学活用的效果。

第三，书中阅读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可以说是妙不可言！许多材料是从古代名著中来的，经过翻译和解说，中国的古代文化就重新活跃在今天的纸上了。这些材料引导读者踏进中国的文化殿堂，了解到汉字沟通古今的特异功能，以及中国人的智慧和幽默是何等高超。这正是欧美人士所最感兴趣的。

第四，这部书用英文解释中文，是一部英文书。安先生的英文写得那么流畅活泼、生动有趣，读者一路看下去，好像在看一本游记（一本《阿丽思漫游中文奇境记》），忘记了汉字和汉语的繁难，忘记了五大册的卷帙浩繁。这是受到欧美人士欢迎的秘诀之一。

安先生用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注音工具。他认为，这套字母比威妥玛（Wade Giles）方案好，但是西洋人要学一下汉语辅音字母的发音，不能用读英文的方法来读汉语拼音。

安先生重视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给欧美人士，但是他决非厚古而薄今。他对文字具有进化观点。他不否定简化字，他甚

至主张把最常用的“的”字简化一下。他还主张把中文按“词”分写，在词与词之间留个空格，如同西洋文字那样，好叫读者一看就知道词的起讫，不必在阅读时候作分词的摸索。

要讨论这样一部五册巨著的优缺点，这里的短评只能说是蜻蜓点水，还可能没有“点”到点子上。希望这部新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对如何对外教学汉语和汉字，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载北京《读书》杂志总第54期，1983年）